

为，坚持教学迎黎明。我的后来者潘世泽先生，往事如烟如荼，刻骨铭心的丙辰正清，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铿锵舞步，工作日志大悲大乐七六年，生命在震荡中蜕变，寒冷中的温暖记忆，揭开迷雾见晴天。不幸的一九九六没有斗牛的故事，三十年前的工作日志大悲大乐七六年，生命在震荡中蜕变，寒冷中的温暖记忆，揭开迷雾见晴天。

书脉

我的一九七六特刊

2007

第 8 期

SHU MAI WEN HUA



古农 主编

目
录

书脉

2007年第8期
总期一九七六年创刊

CONTENTS

- 1 卷首语/编者
- 3 乱中仍有为,坚持教学迎黎明/钱今昔
- 7 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贾植芳
- 12 往事如烟忆萧乾/文洁若
- 20 刻骨铭心的丙辰清明/杨适冬
- 24 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许渊冲
- 30 沉默中等待“神州重光”/安家正
- 34 欢天喜地好还乡/潘亚暾
- 42 一九七六年《鲁迅全集》编辑纪事/郭豫适
- 50 龙的子孙和半寸咸菜/聪聪
- 53 历经风雨见骄阳/张安奇
- 65 关于翻译的一点回忆/陈桥驿
- 67 酸甜苦辣留校园/张穆舒
- 78 怡似平常岁月/权希军
- 81 “洋教头”日记片断/孙幼军
- 92 叶圣陶先生纪事/史晓风
- 98 我在农村工作的悲喜变换/黄甫束玉
- 104 三十年前的工作日志/杨静远
- 113 大悲大乐七六年/甘惜分
- 117 生命在震荡中蜕变/马嘶
- 125 寒冷中的温暖记忆/孙方之
- 127 拨开迷雾见晴天/段存章
- 134 难忘的一九七六/晓雪
- 141 没有斗完的故事/孙涛
- 157 未可高枕而卧/徐中玉
- 161 小小少年的成长记忆/吴昕孺

卷首语

一九七六年，对于我国亿万人民来说是值得深刻纪念的一年，也是改变我国当代历史的一年。而根据这一系列事件创作出来的深挚感人的艺术作品，让从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为之心潮起伏。历史总是会有遗憾的，以平淡若水的心境来对待这份无法逃避的遗憾，是宽容和伟大。能把那段激烈的历史以闲话家常的方式道来，在波澜不惊中给读者以心的悸动，是智慧也是气度。

为此，我们特别辑录了这期专刊作为对这段充满遗憾历史时期的纪念。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一部值得深读与研讨的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太多，每一件都让人刻骨铭心。同样的年代，同样的动荡，同样的混乱，却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心去面对、解读。从钱今昔先生《乱中仍有为，坚持教学迎黎明》我们看到的是在一片废墟中仍有坚强向上茁壮生长的绿荫，给人以安慰和快乐。识时务而顺应天命，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游刃有余者方是俊杰。

从许渊冲教授《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中，可看出在那段黑暗岁月里，不管外面闹得如何的天翻地覆，仍有许多勤勉的学者为了学问而孜孜以求。唐山大地震，对那个多灾多难的特殊年度，马嘶先生以《生命在震荡中蜕变》让我们如亲历了灾难现场一般，平实细致的笔下对生命的伟大与脆弱、坚韧与无奈记录着生活的别种况味，不怨愤、不偏颇、不迂腐，劫后重生的笔情墨意里溢满了作者对生命

书脉

的感念和敬爱。

聪聪在《龙的子孙和半寸咸菜》里，以无声胜有声的传达，把危难时刻下人性的至真至善坚韧美好以再普通不过的半寸咸菜来表现，着墨不多，却别有深意。而潘亚暾先生的心态青春，文亦青春，“我不仅活着，全家安然无恙，而且健康快乐有点钱。”这一句就足以读出作者的率真性情和乐观心态。虽也遭下放、也遭迫害，总是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哪怕是在艰苦的岁月中。

从动荡年代的酸甜苦辣中写出人生百种滋味，这种豁达向上的人生态度令我辈欣赏尊敬……

特殊年代的人们总会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值得记忆追索，尤其是那些知名的学者文士名流的所见所闻所感，从他们当时的信件、手札、日记或后来的回忆中，或多或少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和藏在深处鲜为人知的史实。为了那些值得回忆、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我们谨以这册小书来纪念，相信此书对于了解特殊时期的中国历史有着真实而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者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乱中仍有为，坚持教学迎黎明

钱今昔



一九七六年八月

钱今昔在室内讲打乒乓球技术

有络绎不绝的访问者。当时我们在师范大学，已经恢复了到中学教学实习和下厂实践的正常秩序。那是一九七六年，沉沉的黑夜即将逝去，清新的黎明就在眼前。

(二)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北京。虽然“四人帮”不准人民悼念，但螳臂岂能挡车，巨星陨落，万众同哀，校园内一片哀泣

声。好多青年学员，都公开臂缠黑纱，戴很多时日都不愿拿下。

二月中旬，我率领一批学员到附中进行教学实习，在课堂上，歌颂总理的治乱精神，针对谁？是再明显不过的。

当时有些单位发行了油印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传略》的小册子，师生们都如饥似渴地设法得到，不用避讳地公开阅读议论。还有手抄本的总理诗词、朱德诗词都悄悄地流行在群众中。

(三)

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暴徒殴打纪念周总理的群众。同月，敬爱的小平同志被撤消领导职务，垂死的“四人帮”竟下令学校停课，再度实施疯狂的破坏活动。可是在令人窒息的大字报丛中，中央对外贸易部的邵祖泽同志，无惧白色恐怖，紧紧地同我握着双手，传达了“不要理会他们，仍希望你们完成国家委托的重要任务”的坚定信念。

原来，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同曹菲、丰平等同事曾接受研究国际石油动态的任务，写了一些初稿。却遭到“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攻击，说“吃了上海的饭，却给北京做事”。文章被扼杀，只剩下一份“若干国家石油统计资料”。那是我们辛勤地在全市许多单位，跑图书馆、钻资料室，从尘封的厚厚的OECD、OPEC、U.N、BP等^①的报表、统计、总结、测量中编制而成的。幸而它漏网，引来了邵祖泽同志的支持。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原动力，又是每个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源，我们的工作是为国家制订能源政策参考的。以此为借口，我们拒绝参与不得民心的“批邓运动”，不写一张大字报，不参与一次会议。我们又会同唐剑、倪振一起，带领五个学员开拔到位于浦东的上海炼油厂，打出开门办学的旗帜，同厂内的技术人员和青年工人们一起生活、劳动并研究石油与国民生产发展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国家要富强、生活要提高，必须要有持续的稳定和扎实的建设，从而否定了动乱与破坏，有意

注：①OECD是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PEC是“石油输出国组织”、U.N是联合国、BP是不列颠石油公司。

无意地映衬出“四人帮”的罪恶行径。

虽然面对的是那些死硬造反派的虎视眈眈，但曙光已在前面，惊恐中仍多希望与勇气。

几个月后，到九月初，毛主席逝世了，市内和厂内的形势顿时十分紧张。“大批判”急剧衰退。工人们自发地频频巡视厂房，防止“四人帮”爪牙作临死前的大破坏。

大地一声春雷，十月初，“四人帮”覆灭，神州大地重现了光明。我们重又回到了美丽的校园，积极参与重建教学秩序、开展科学的研究的活动。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
在家中的自摄像

(四)

“四人帮”的余党们梦想对上海作最后一次大破坏。曾由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但没有一个人、一支枪听从他们的指挥，叛乱一下子流产了。

在绚丽的十月阳光下，从四面八方，从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居民住宅区涌现出大量的人流、车流，旌旗飘扬，歌声嘹亮，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国际歌……充塞了大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平方米的空间。特别是汇集到黄浦江畔的外滩，高音喇叭喊话器冲着那龟缩在“市革委”办公室中的“四人帮”余党，声讨他们的罪行，呼叫他们向人民投诚，交代罪行。

上海人民解放了，上海人民彻底解放了。

以后“四人帮”的余党头目们，都被革命法庭判了罪，服了刑。被他们杀害的烈士、陷害的群众都恢复了名誉。

书脉

之后，我们的教学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一年一年的招生，一年一年的毕业。作为一名教师，看到学校教学有序地进行，内心是甜滋滋的，乐乎乎的。

我们的科研工作也走上了通畅的大道，顺利完成了“国际石油动态的研究”。作为国家能源工作的一项参考，此项成绩得到了国家外贸部和石油部的嘉奖。同时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陆续编写完成了《战后世界石油地理》《世界的石油》《中国的能源》，并分别由北京、江苏和上海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于今，三十一年匆匆过去，我已是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最年轻的也已成为资深的在职教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幸福生活圈中，再回忆一九七六年那艰苦战斗的一年，那热情激昂的一年，我总会从沙发上站起，引吭高歌那一曲《毕业歌》，那是我最喜欢唱的歌，从青年到晚年都最喜欢唱。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华东师大校园

【作者简介】

钱今昔 一九一八生于江苏吴江。一九三七年入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创立了能源地理科学体系及其基本法则，提出多能互补、纵横网络的能源技术经济学理论，并致力于自然、技术、经济三者和谐平衡理论的探索。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获得者。出版专著有《解放了的西藏》《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研究》《战后世界石油地理》《未来石油资源开发及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影响》和《中国的能源》等。还主编《文艺》和《人文地理》，编写《上海风景线》《新哲学的地理观》《世界地名辞典》和《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等。

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

贾植芳

克林顿那年访华的某些行程安排得颇有些怀旧的意味，比如在北京大学演讲，那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在传播西方文化上是开风气之先的；在上海则去了上海政法大学，它的前身便是上海开埠之后英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这件事对我是个触动，使我想起“文革”时的难友、圣约翰大学校长潘世兹先生。

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外国人办的学校和私立大学都取消了，教师也全部统一分配。我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调到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潘先生也由圣约翰调来，作外文系的教授兼复旦大学



一九七一年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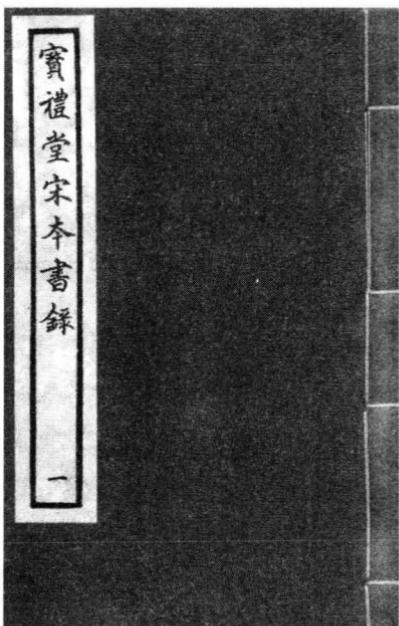
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夫人陈永娟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学校的“校花”，和潘先生结了婚，此时也跟着到复旦外文系当讲师。

开始我和潘先生不熟，他住在市区，我住在校内，有时彼此碰到了，不过点点头打个招呼，倒是同他夫人相熟些。他夫人的家庭原是英国太古公司的买办，她从小在西方接受教育，所以汉语还没有西文来得好。有时在教师休息室碰到，她会向我请教一些英文汉译方面的问题，

从此就熟起来，偶尔还开开玩笑。那时还没有许多的约束，我不愿穿制服，常常是一件长袍。记得潘夫人是比较讲究的，打扮时髦，还化着妆。听说潘先生的父亲潘宗周（编者注：即宝礼堂主人）是英国租界公部局的中国官员，文化不高，但很有钱，于是送儿子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潘老先生喜好藏书，收集了不少宋元明清版的古籍善本，是一位大藏书家。潘先生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思想进步。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留下来，一九五〇年参加了民主同盟，并将父亲的藏书无偿献给国家，在社会上是一件十分轰动的新闻。当时我所知道的潘先生就仅止于此了。

“文革”前，我被法院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刑十二年，在监狱里蹲了十一年，一九七六年被押回复旦大学，由学校保卫科分到印刷厂监督劳动。这才听说潘先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外文系教授孙大雨等两位著名教授组织的所谓“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孙大雨是民盟成员，国民党统治时期组织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可称得上与共产党肝胆相照，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不服，于是上书党中央，称上海及复旦文教方面的领导是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所以才将他这样的民主人士打成右派，结果以诬告罪判刑六年，押送苏北大丰农场劳动。

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关照下面给予适当照顾，并提前一年将其释



潘世兹之父潘宗周藏、张元济编《宝礼堂宋本书录》1984年广陵古籍社影印

放回上海。“中国社会党”事件发生后，孙先生也刚回来不久，于是交由里弄委员会严加管制，在南市区的城隍庙扫地。王造时和潘世兹则被抓进监狱。王先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抓进去后死在监狱里。潘先生被关了七年，放出来后也被分配到印刷厂“劳动改造”，我们于是就成了难友。当时潘夫人仍在外文系教书，上海公检法机关给家属一纸判决书，判决潘先生“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她不解其意，拿着判决书到处向人询问打听。

在印刷厂受管制期间，我除了管油印，还干些重活，比如扫地、打扫公共厕所、通阴沟、搬运重物、拉劳动车等等，总之是些最累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潘先生年纪比我大，就做些相对轻些的事。如把大张的纸折叠整齐，再裁出来。接受专政小组批斗时，他不住低头点头，说“我是洋奴、买办”等等，或者就在下面写检查及思想汇报。有一次，他对我讲：“你的情况和我的不同，你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我是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走狗。”我立即抗议道：“你别诬蔑我，我只是个作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

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晓得我进步教授的身份。我进震旦中文系当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颇带点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这样的人对左翼作家怀有偏见，一概将他们视为“宣传员”而非作家。他听了我的申辩，笑着说：“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

他原先住在沪西一幢挺大花园洋房里，“文革”被抓的那天早晨，他还未来得及吃早餐，就被冲进来的造反派开了批斗会，并当场宣布逮捕法办。这时四个警察突然从厨房冲出来，立刻给他戴上了手铐。原来人家前一夜就埋伏在那里了。房子大，潘先生一家居然不知道家里还藏着陌生人。判刑后，房子就没收了，警备区的政委搬了进去，潘夫人和孩子则被赶进一幢公共大杂楼的一间房子里，过起了与人合住的生活。但因为他们是所谓“反革命家属”，被周围的房客看不起，倍受欺辱歧视。潘先生出狱后，他们家里换洗的衣服晒出去，因为有些是外国货，

常常被别人顺手拿走，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不过潘先生的确有钱，在印刷厂时带午饭，常有烤乳猪、炸牛排、叉烧、酸牛奶、矿泉水，面包夹果酱、奶酪，这些西式餐点当时很让工人新奇，不晓得那是些什么。他没事时还吹个口哨，是一个蛮有趣的人。

一九七九年，潘先生平反了，当时我尚未平反，但解除了监督，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有一天遇见潘先生，我问他现在教什么课，他说教英美概况介绍，我说你介绍一下美国的监狱情况吧，彼此都笑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典故，我和潘先生都坐过人民政府的监狱，一次潘先生跟我说，美国监狱在犯人生活待遇上和我们的监狱是不一样的，除了人身不自由，生活上是人道主义的。早晨吃牛奶吐司，中午晚上吃牛排或猪排面包，到周六家人来探访，狱方安排 Picnic，在监狱空地上搭个帐篷，放留声机，跳交谊舞，犯人的人格是受到尊重的。这就是“介绍美国监狱”云云的来由。潘先生又问我是否还去印刷厂，他说他每天去外文系上课，中午还是带了饭到印刷厂去吃，然后稍事休息，那里的工人现在对他蛮好，孙子出世的时候，他发给每人一块巧克力。他说那是咱们的外婆家，不能忘了，要去的噢！

“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潘夫人的姐姐在联合国做事，这时两家开始恢复通信。姐姐写信来给妹妹，说你在信上从不提潘先生，是他已经过去了，还是你们离婚了呢？姐姐要回国看望他们，那时家里除一桌一床别无它物。潘先生要争中国人的面子，于是去找当时外文系革委会主任龙文佩，说亲戚从美国来，家里连张椅子都没有，按西方人的习惯，让客人坐床是很不礼貌的，于国家影响也不好，希望领导暂时给他们一间旅馆房间招待来宾。这位龙主任说：“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这个待遇，你跟亲戚讲清楚你的身份，不必隐瞒！就在家里接待！”当然，姐姐来了，是没法子住在潘先生家里的，只好自己去住了宾馆。

“文革”结束了，潘先生在宝山插队的儿子先去了美国念书，随后潘夫人跟了去，并在那儿定居，潘先生退休后也去了。但过了两年他又一个人回来了。当时新闻系一个叫朱莉的学生，在校报上写了篇文章，

介绍潘先生的近况。她告诉我，她去看过潘先生，一个人雇了三个保姆。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我以现任馆长的名义邀请前任馆长潘先生参加开馆典礼，并一起吃了午饭。以后潘先生翻译《三字经》，写信给我，用的是宣纸信笺，以毛笔小楷很郑重地写：“贾植芳大兄钧鉴，译《三字经》，想查有关版本，望吾兄大力协助”云云。潘先生译的《三字经》后来在新加坡出版了。

潘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解放时留下来，想为国家做些事，他捐书，受过政府的表扬，又参加了民主同盟。然而，一九五七年讲了几句话，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到诬陷，坐了七年牢。就这么坎坷半生。后来，也没有什么病，年纪大了，就过去了，享年八十四岁。我是在报上得知他去世的噩耗的，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但自己年纪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然而他的神情谈吐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们相处在一段特殊岁月，对潘先生的处世为人亲历过，他品格高尚，为人正直，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朋友。

一九九五年十月于上海寓所
(二〇〇七年三月重新校改)

【作者简介】

贾植芳 一九一六年出生于山西襄汾。曾赴东京日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近采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贾植芳文集》等，译有《俄国文研究》等。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往事如烟忆萧乾

文洁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萧乾拍于北海公园
一座。场内稀稀落落没有多少人。总理在南开中学时就演过话剧，只见他指指点点，也许是在提醒对方哪些不足之处该改进。

一九五〇年，萧乾作为访英代表团的一员，在中南海受到总理接见。代表团团长为刘宁一，乾是代表团秘书。总理挨个儿跟团员谈话。轮到乾，他深情地说：“在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位师长也叫萧乾，后来牺牲了。一九三七年在武汉，每逢读到你的文章，我就想起他来。”代表团临上飞机的头天晚上，乔冠华打电话通知萧乾，他被除名了。次日又当面对他说：“你还是在国内转转吧。”一九九六年，严文井在他的忘年交靳飞的陪同下光临舍下，趁着我带靳飞去另一个房间看藏书的当儿，私下里告诉老友，早在一九五六年，他的问题就审查清楚了。倘非

一九七六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恸。提起周总理，每一个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有几个小故事。一九五六年，萧乾给了我一张青年艺术剧院的彩排票，记得是契诃夫的《樱桃园》。我刚刚坐下来，总理就由人陪伴着，在距我不远的地方落

严文井凭着个人交情透露给他谜底，萧乾会终生闷在葫芦里。

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期间，我曾劝乾老老实实埋头工作，什么意见也别提，一篇文章也别写。由于三月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乾觉得倘若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于是，他写《“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变成了衙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二文，先后发表在五月二十日的上海《文汇报》和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多年后，读了黄秋耘送给乾的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我才得悉，五月十八日晚上形势就逆转了。当然，只容许周扬、张光年等少数人知道内情。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引蛇出洞”的内幕。然而，七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乾竟然也收到了一份请柬。当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他的名。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八版刊登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大毒草”《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总理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乾应声起立。总理和蔼可亲地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讨，积极参加战斗。”接着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并照样宽慰了他一番。

不论是反右斗争还是十年浩劫，总理都在力挽狂澜，到头来寡不敌众，未能扭转乾坤。

然而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二十二年，每逢想起总理，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从此，干校的日子好过一些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允许把孩子送回北京去上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也从未相信过“四人帮”能永远飞扬跋扈。文革初期，我们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搬到南沟沿的一间小东屋去。为了让儿子转学到五中，我把房子换到喜报胡同（现已恢复旧称：门楼胡同）。这座四合院早先是一家私人医院，

我换到的十二平米南房当年是门房兼挂号处，仅挨着门洞。

“文革”以来，我三姐常韦一直被当作有问题的人在街道上劳动。迁户口时，我到派出所去一打听，原来她什么问题也没有。将儿子桐儿安顿好后，我就到商务印书馆去找陈原社长，他答应把我调到商务去编字典。

一九七三年一月，乾请假回京探亲。他一趟趟地往房管所跑，一位副局长带头替他把八米门洞改成一间房子。七月九日我被调回北京，刚好赶上小屋竣工。乾在这里足足住了五年多。

有一天，桐儿一进门就大谈“红都女皇”，我马上制止了他。他噘起嘴来说：“同学都在议论”。我警告他道：“同一句话，红五类说了，是认识问题。你说了，就是立场问题。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此事反映了连中学生都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起了反感。

周总理溘然长逝，使一切正直的中国人如丧考妣。不言而喻，这颗巨星的陨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的灵柩车
自北京医院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手里保存着一张小照片。摄影者捕捉了载着总理灵柩的白色车辆驰过天安门的镜头。北京的老百姓自发地排在十里长安街上，冒着严寒，为人民的总理送别。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他曾一年年地站在毛主席身边，向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致意。当然，他从未做过第二把手，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

一场“文化大革命”，不论最初的用意是什么，导致中国老百姓在梦魇和浩劫中苦苦挣扎了十年，所看到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了五

顶帽子惨死，一向怕风、怕见阳光的林彪忽然变得“永远健康”，他的“大”名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公然写进党章，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林彪自我爆炸前，在咸宁五七干校第十四连的露天大会上，连部一位女同志拿着一本一九七一年八月号的《解放军画报》给五七战士看，刻意介绍了林彪像煞有介事地拜读“红宝书”的彩色封面。她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替林副主席拍的。林副主席最喜欢这张照片啦。”耐人寻味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江青非但未受影响，反而日趋专横跋扈。

一九七六年春节后，桐儿高中毕业，去平谷县齐各庄插队，队里分配他养猪。女儿荔子是一九七一年底回京的，当上了113路无轨电车的一名售票员。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是星期六。那天上午，我们跟着出版社的一批人给总理送花圈，目睹了一派壮丽情景。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乎被各机关、学校、工厂送来的大大小小的花圈埋起来了。四下里，杉篱上挂满纯白小纸花，宛若覆盖着盈盈白雪。悼念者统统是自发地、情不自禁地来的。

我在出版社的食堂吃罢饭，回到“门洞”去，替乾眷清一份审书报告。我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乾马上就有活儿干了。起先与人合译《战争风云》。他是十个译者中最年长，最出活儿的，共译了十章（十六万三千字），还校订了五章（六万三千字）。一九七四年，咸宁的干校解散了，他被编入国家出版局仿照上海的模式办的翻译组。该组设在北总布胡同的版本图书馆里，由一位原新华印刷厂的女领导负责。他每天骑车上班，一九七六年与人日以继夜地突击抢译《拿破仑论》。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那是伟大领袖点着名要看的“大字本”中的一种。

除了翻译和校订，乾还有个特殊的任务，每周骑车到文津街的北图去借交换来的海外新书。梅兰芳的长公子梅绍武负责西方组的图书。他慷慨友善，乾得以借到大量新书，将值得翻译者写成报告。《麦克米伦回忆录》《光荣与梦想》《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